

研讨实录

第 136 期

136

2020 中国经济论坛——迈向十四五的我国经济
赵鼎新：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993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2007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年和2010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Hu Xizhao in black ink,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来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本基金会 12 月 10 日举办了“2020 中国经济论坛——迈向十四五的我国经济”，钜派投资集团为论坛提供了支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先生发表了主旨演讲“结构性潜能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有发展潜能。他提出 1+3+2 的框架，1 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 是在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基础产能效率不高的短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 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在随后的演讲与互动环节中，有四位专家发表演讲并与听众互动。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朱宁的主题是“双循环的机遇与挑战”，他指出我们有四个机会（技术进步、全球化、

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巨大的高速增长的内市场）和四个挑战（房价和房地产市场、财富分配不均、老龄化、债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的主题是“对双循环下内需问题的几点思考”，他指出双循环的关键是增加国内需求，包括增加有效投资，增加内需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包括逐步消除城乡分割，即市民化的问题。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的主题是“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他认为核心问题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刘焜松的“对我国房地产现状和走势的分析”，他估计 2021 年房价还是以平稳发展为主，可能会涨一点，但幅度不会大，城市之间会分化，好的城市、好的地段、好的房型的房价不会下跌。

本基金会 9 月 2 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 162 期上海发展沙龙，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先生作了题为“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演讲。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认同，家庭之外认同感的建立主要

得靠某种形式的外在强制性想象，或者说，家庭以外的认同感的建立主要靠的是意识形态和强制（即政治），而不是什么客观基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对全世界的强加，所有的非西方民族主义（包括“中华民族”）是被动的回应。这一被动回应在西方思潮和西方政治主宰的客观条件下非常有必要，但这也并非唯一有效的回应方式。政治—意识形态互动框架是理解民族主义这一现象最为有效的视角。基于这一视角，可以把民族主义的发展分成九个阶段：1、犹太—基督教带来的意识形态突破。2、西方君主通过再征服运动、宗教战争控制本国宗教。3、七年战争和美、法革命。4、拿破仑帝国扩张，民族主义成了扩散力量，族群民族主义形成。5、英帝国将民族主义带到东方，日本成为一个中转站。6、一战、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民族运动的兴起。7、二战，英、法、日帝国的垮台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全球化。8、“第三次民主浪潮”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9、第三次民主浪潮的终结和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多样化。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会议议程	1
开幕式致辞	3
张立平致辞.....	3
主旨演讲	6
刘世锦：结构性潜能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6
演讲和讨论.....	30
朱 宁：双循环的机遇与挑战.....	31
万广华：对双循环下内需问题的几点思考	40
花长春：双循环新格局下， 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52
刘焜松：对我国房地产现状和走势的分析	60
互动讨论.....	71
赵鼎新：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81

会议议程

时间	内容
12月10日下午 三楼大宴会厅	
14:00-15:00	开幕式 主持人：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办方致辞 张立平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 国盛集团原董事长
	演讲嘉宾：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演讲题目：“ 结构性潜能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
15:00-15:20	茶歇
15:20-17:00	发言 & 讨论 主持人：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监事
15:20-15:35	演讲嘉宾： 朱宁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 演讲题目：“ 双循环的机遇与挑战 ”
15:35-15:50	演讲嘉宾： 万广华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演讲题目：“ 对双循环下内需问题的几点思考 ”

时间	内容
15:50-16:05	演讲嘉宾： 花长春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演讲题目：“ 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
16:05-16:20	演讲嘉宾： 刘焜松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 演讲题目：“ 对我国房地产现状和走势的分析 ”
16:20-17:00	讨论 & 问答
17:00	会议结束

开幕式致辞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2020 中国经济论坛——迈向十四五的我国经济”年度论坛现在开始。首先，我们有请主办方代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国盛集团原董事长张立平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张立平致辞

张立平（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国盛集团原董事长）：尊敬的刘世锦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热烈欢迎各位参加“2020 中国经济论坛——迈向十四五的我国经济”。我谨代表主办方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向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贵

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最新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4.4%，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预计明年将会更好。这是因为我国控制疫情成效显著，工作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同时疫情期间我国经济政策宽紧适度，应对得当，经济运行先降后升，稳定复苏，增速领跑全球，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十四五”规划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巩固提升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地位。

在我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发掘的潜能和需要防范的风险？明年的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强劲的势头？“十四五”规划有哪些特点要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我国以及“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增长会产

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大家所关注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高兴地邀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先生给大会做主旨演讲，还邀请了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朱宁先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先生，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先生，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刘焜松先生为我们做专题演讲，相信他们的演讲和大家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的形势，为经济工作和投资决策提供信息和启发。

最后，我代表主办方对本次论坛的支持单位钜派投资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旨演讲

刘世锦：结构性潜能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乔依德：下面是今天研讨会的主旨演讲。刘主任原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他参加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十九大报告起草工作，是中国国家“十四五”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著作多次获得中国经济研究最高奖、经济科学奖等。他今天演讲主题是“结构性潜能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主任给我们做演讲！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尊敬的乔会长、张会长，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就“结构性潜能与相配套的改

革开放”这个题目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涉及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中长期发展的一些问题。

从目前经济形势来讲，大的背景大家是比较清楚了，中国经济首先受到疫情的冲击，但是我们是率先恢复的，而且恢复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也有一些亮点。比如说出口，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认为出口很可能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出乎意料，今年中国的出口表现非常出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防疫产品出口确实有一些新的需求，但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出口企业反应迅速，市场能力已经形成，改革开放 30 年来，整个市场基础改变了。

三季度增速已经到了 0.7%，全年可争取 2% 左右的增长。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有增长。从增长速度来讲，7-8% 甚至更高一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误解，中国经济是不是又要重返高增长的轨道呢？不是，这就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因为今年基数低，才增长 2%，本来要增长 5—6% 的。明年恢复到正常的水平，最后的增长速度统计下来应该是 8% 以上，所

以还是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今年本来应该增长，没增长的部分是回不来的，明年恢复到正常增长就可以了。

但是今年有一个特殊情况，今年中央并没有出一个增长指标。明年怎么办？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本人作为演讲者，提了一些看法，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 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为什么特别强调就业指标呢？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说 GDP 多少，我们领导同志经常讲，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增长背后是就业。现在能不能让就业站到前面呢？你看发达经济体讲经济形势的时候，就业指标都是第一位的，中国能不能把这个指标推到前台？另外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业指标也是能够全面衡量全社会资源配置状况的，也就是说就业好的话，整个资源利用效能比较高。我认为这个指标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一个硬指标，应该是一个力争完成的指标。

目前就这个指标是什么状况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指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有一个每年新增就业人数指标，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城乡统一的衡量就

业状况的指标。为什么没有呢？过去说我们是二元经济，很多人还在农村，农村人的就业状况很难统计，存在大量的潜在失业，只算城里的就业状况，农村就业状况就不算了。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城镇化率已经 60% 了。更重要的话，我们的统计能力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疫情期间的数字跟踪能力，我这两天坐了好几次飞机了，每次登飞机、下飞机，必定要你出示健康码。上海还不错，各地码都能用，但是到了广东就必须拿出当地的码，但是都得有这个码。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拿出疫情跟踪统计的这么一个劲头，拿出这些技术，不用全拿出来，拿出一部分，得出全国城乡就业状况在全世界领先的客观准确的指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呼吁，也是希望咱们政府，能不能到 2021 年，把这个指标它推到前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条件。

这个指标有了以后，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指标，包括一些年度性指标，比如说国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疫情以来宏观杠杆率上了 20 个基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怎么衡量全要素

生产率？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这个指标特别重要，中国现在提出了 3060 的目标。GDP 肯定还得要，GDP 是社会的伟大发明，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公认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总体状况的一个指标。

最近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提了一个目标，到 2035 年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全会通报中没有提出来，今后 15 年我们有没有可能 GDP 再翻番？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在“十四五”规划中直接提出来，我们不要过度追求 GDP。今后 15 年，如果 GDP 要翻番的话，每年需要增长 4.7%。如果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现在挺复杂的，什么叫中等国家水平？按照目前的标准，进入发达经济体，大概是一万七，一万八美元左右，就进入发达经济体这个门槛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30,000 美元，中等发达国家是 20,000 美元。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中国如果说要实现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水平，假定汇率基本不变，或者小幅增长，GDP 增速 6% 的话也就达到葡萄牙

的水平。这可能吗？中国还能保持 6% 以上的增长速度吗？不可能的，中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那中国是不是就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我们还有很大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 PWT9.1 数据库资料，2019 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以 2011 年为不变价）约为 14682 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 1975 年的水平，德国 1971 年的水平。从 1975 年到 1991 年 16 年间，日本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 4.4%，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 5.1%。日本实际 GDP 累计增长 199.6%，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 2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 GDP 增长来看，GDP 实际增长的贡献约为 47.5%，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约为 52.5%。德国也是如此，从 1971 年到 1987 年 16 年间，德国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 2.3%，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 4.3%。德国实际 GDP 累计增长 1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 1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 GDP 增长来看，德国 GDP 实际增长的贡献约为 42.3%，德国马克兑

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约为 57.7%。

从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来看，和领先国家相比，人均收入水平缩小，汇率增值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要实现 1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水平，没有 8-10% 的速度是不行的，这个速度实际上不可能的，但没有悲观的必要。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要关注汇率的升值，它的贡献将来可能更大。汇率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提高要素生产率，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当然汇率升值的原因非常多，我这里面是高度简化了，但是一定和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这两个高度相关。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像日本在那个期间升值 2 倍多将近 3 倍，我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是有可能的，注意力还是要集中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问题我不是专家，在座有一些同志都是专家，我只是特别讲一个问题，我是担心大家又开始讲把速度搞上去，搞不上去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就实现不了。

中国的正常状况是什么呢？是中速增长，中国已经跨过高速增长阶段，正常状态就是 5-6% 的

中速增长平台。我去年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讲过这个问题，我的这个观点是一贯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然我知道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很多同志认为中国还能保持高速增长。我也挺希望高速增长，但是我们搞研究的要尊重规律，规律告诉你，它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个中速增长，原因在什么地方？在于可利用的前沿技术已经不多了，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等，每个问题咱们都可以讲一天，我就不展开说了。所以，中速增长平台现在已经形成了，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希望保持 10 年，这样的话就涉及到 2035 年的目标，就可以给它打下一个重要的基础。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宏观政策问题，我的观点是，随着经济逐步回到正常状态以后，宏观政策也应该回归常态。今年由于特殊的情况，我们确实实施了比较特殊的宏观政策。我觉得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放松幅度很可能低于一些人的预期，但是这个幅度基本上满足了我们经济的需要。所以有人说货币政策是不是要收紧，其实也没有放得特松，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回到正常状态以后，不意味着

一定要收紧，需要松的时候就松，需要紧的时候就紧。我想从目前来讲，短期之内回归正常状态并不意味着明显的收紧。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些表现，最近大家在谈在房地产和股市上会不会出现泡沫，特别最近信用债爆雷，还有地方债的问题。我们希望能有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宏观杠杆率已经升了 20 多个百分点了，其实没有必要再把它提高，逐步稳住，逐步往下降，这些从长期稳定来讲都是必须的。

我们经常讨论很多宏观政策问题，开个会见了媒体，他们都问，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到底搞到什么程度？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增长就得靠宽松的宏观政策。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速增长，起码最近几年在 5.5% 左右，明显比发达经济体要高，是因为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所以，中国经济逐步回到正常状态以后，宏观政策回归正常状态，中国经济下一步真正要稳定增长，关键还是要关注结构性潜能。我们的结构性潜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基建、房地产、出口这些结构性潜能都在减速，有些

在减弱。中速增长期这个结构性潜能到底怎么样，怎么发掘？这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关注的重点。但是我感觉到，对这个问题大家反而有时候不太关注，关注得不够。

我们的速度降到 6%，甚至降到 5%，这个速度的问题我觉得很容易造成数字幻觉。我们现在速度和当年比起来的话，已经下降了，但是基数每年都在加大，我们每年经济的新增量是相当大的，只是相对于基数的比重相对少，但是新增量每年在全世界还是最大的。举个例子，2019 年我们增长 6%，去除价格因素后，把新增量放在 2000 年相当于增长 30%，放在 2010 年相当于增长 11%，其实量都是很大的。中速增长这么大的增量到底从哪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的话，能不能撑住本身也是问题。

下面重点讲一讲什么叫结构性潜能？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有发展潜能。

第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我们现在人均 GDP 是 1 万美元，发达经济体一般在 4 万美元以上，至

少有 3 万美元的差距。这对增长来说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可以去做的，他们已经做了。最近几年，我们发展很快，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赶超，已经很少有人说追赶了，也很少说学习了。我觉得还是要学习，1 万到 4 万中间有 3 万美元的差距，人家已经把事做了，有很多经验教训，学一学你会更快地进步，成本很低，为什么不学呢？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把身段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上，还得讲究学习。

第二是新涌现的潜能，这个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主要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对结构性潜能，我本人提了 1+3+2 的框架。1 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下一步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 是在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讲补短板，在结构风险、污染防治，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新的三大短板一定要补上。

一是基础产能效率不高的短板，能源、物流、

交通、金融、通讯等这些基础产业领域还不同程度存在短板。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直讲要降成本，每个企业都要降成本，其实最重要的成本是全社会的成本，所以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降低成本，最后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的短板。我们国内，收入在1千块钱左右的大概是3亿人，2千块钱左右的大概是4亿人，还有2亿多人在2千到3千块钱之间。如果月均破了3千块钱，基本上到了中等收入群体。所以，中国下一步，我们讲扩大消费也好，人力资本提升也好，现在我们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者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有4亿人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4亿人确实应该提高收入，也是消费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4亿人之外的那几亿人，要让他们赶快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用10到15年时间再翻一番，现在4亿人变成8到9亿人，让现在3到4亿低于中等收入的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个问题解决了，消费问题就解决了。

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我们现在在科

技领域面临美国要脱钩的压力，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给深圳市南山区的街道办干上了。美国在卡脖子，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内部有没有卡自己脖子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瓶颈。不论从科研领域，创新的角度，还是整个国民经济，很明显有一个卡脖子的环节，就是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还是不强。当然我们这么多年有很大进步，包括数字经济领域，但是你说有什么东西是本来世界上没有，而由是中国人首先搞出来的，确实不多。而且现在也有人讲，我们主要是搞应用，源头创新、技术研发让别人去搞，别人就是欧美国家。近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如果你不去做基础研究，别人就会卡脖子。另外基础研究是一个环境，基础研究是水，水涨船高，没有水的话，船是升不上去的。如果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不能站到第一梯队，应用能否搞成世界领先恐怕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其实你的应用也是二流、三流的，应用搞不到一流。所以中国基础研究这个卡脖子问题不解决，中国创新搞上一段时间就没劲了。

1+3+2 的框架的 2 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这个我就不讲了，这是全球性的，比较新的，中国具备一定的优势和增长潜能。

简单地说，1+3+2 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当然有人会说，经济增长讲的是消费、投资、进出口，你讲这个东西和它有什么关系？从国民经济分析的角度，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角度，你得看消费、投资、进出口是从哪里来的，我讲的是中速增长的来源，消费、投资、进出口在这些东西里全含了。1+3+2 这些潜能中国是有的，但是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充分利用起来，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往往受到很多限制，看得见但抓不住，这种例子挺多的。这就涉及到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第一，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现在对大都市圈的发展来讲特别特别重要。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宅基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是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让它进入。最近几年我们也在搞各种各样的试点，村宅基地只在这个村的范围内流转，一个村

的大爷大叔那些人里可以流转，但真正需要的是外村的人，这个现在是不允许的，会有很大争议。前一段时间发改委也发了几个文件，还是要创造条件，让它流转。现在各地政策不一样。有人说，宅基地如果流转的话，可能损害农民利益，农民拿来钱就去喝酒了，晚上没有地方住了。这里面涉及到怎么看农民的问题，那种人有没有呢？100个人可能就一两个人，农村一定有，但是这种人在城市里就没有吗？也有。大部分农村的人，100个人里的98、99个都很清醒，对自己负责，他不会去做这些事的。我曾经见过一个县委书记，他在农村这么多年和农民打交道，发现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算盘打得清楚得很。土地问题只有在流转交易以后，你那个地值多少钱，价格才能显现出来，农民利益才能真正显示出来。你不让他交易，有多少利益他都不清楚。

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这里涉及到城市规划问题。这么多年大城市一直说人太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城市到底应该有多少人？是城市规划者们说了算呢？还是另外

的力量在决定人口多少？我跟他们有关部门讨论过一个问题，我看他们的文件，里面从来没有讲过市场，市场这个词出现的概率，如果不能说没有的话，也是频率极低的一个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央文件讲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得重视市场，什么是市场力量？其中最明显的市场力量就是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老百姓自己拿脚作为投票的机制显示出来的。最近几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或者流入最多的是什么城市呢？是杭州、深圳这些城市。所以我就说，在我们的空间规划、城市规划中间，还是要尊重市场的力量，尊重市场的信号，你得按照人口流动的方向、规模来配置资源，包括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并且按照人口布局变化调整城市规划。

第三，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其实中央文件把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但是基本上步子不大，我觉得不能再拖了。把这些领域放开，鼓励竞争，可以产生很多新的投资需

求，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讲的，降低全社会的成本。

另外我们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转型。产业政策这个概念，其实可以把它换成一个营商环境政策和要素提升政策，这样可能更符合我们这个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所以政府不要再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投资和设备规模作为准入条件，也不要再给地方和企业戴帽子、发牌子，防止寻租和腐败行为，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

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户口问题、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的社保要逐步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健全社保体系，加快实现全国统筹，异地结转，增加便利性，促进劳动者的利益。

要深化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的改革。我们提出，能不能搞点新的特区，当年我们在深圳搞经济特区，现在需要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能不能在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

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杭州搞的西湖大学开了一个头，当然他们还在试。我们应该采取特区这类的方式，更多地推出新型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和研究机构。

再就是解决科技“卡脖子”的问题，现在讲新型体制，比如英雄榜的方式，引入竞争机制，重点向民营经济开放。

关于数字经济，我就讲一个观点。数字经济现在讲新基建，所谓新基建和老基建是不一样的，老基建基本上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新基建是企业做的以数字技术为主的带有平台性质的一些项目，整个的投资机制、回报机制是完全不一样，不适合作为短期刺激政策的工具。

绿色发展也是一个大题目，是新风口。最近这个领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进展。习主席代表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承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以后这个国家是碳零增长，我们现在的技术体系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我们现在的经济核

算方法是不符合要求的，甚至我们的发展理念要有实质性的转变。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碳中和目标将引起中国社会的变化。有人说，距离 2060 还有 40 年呢，我说 40 年确实比较远，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得倒排时间表和路线图。所以我认为，这将会带来中国一场伟大的绿色技术革命，一场伟大的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势在必行的。这里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核算的问题、技术推广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和生态责任账户体系。

最后是对对外开放，实际上全球化就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或者说不同国家市场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倡导者、维护者，在全球市场体系发展竞争中，我们不应该落在后面，我们也不能满足于挤在中间，应该站在前面，占领制高点，起引领作用。三个零这张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应该把它打出去。这件事要真正推行，难度非常大，但是这很可能是一个方向，而且我们站上这个制高点以后，就占据了主动。最近中央特别强调，我们对外开放是制度规

则型的开放，怎么来推动制度规则性的开放？应该是要力争第二次入世，中国已经签署了 RCEP，习主席也宣布中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 CPTPP，因为 CPTPP 是比 RCEP 水平更高的区域合作组织。这就涉及到国际谈判中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说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策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这些是我们自己要改，还是别人要我们改？希望大家好好学学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文件，不是别人要我们改，都是我们自己要改，我们要转入一个高质量发展，这件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要通过高水平开放，加快发展。

最后，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指方向，就是往东，往西，划底线，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做法适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企业的实际？还是要调动各个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了，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80 年代是 80 年代的河，现在

这条河不一样，还得摸着石头过，还得探索。中央只是说，你得过河，从这边走到那边，给你指方向，另外过河的过程中不要把自己淹到那去。你得过去，到底怎么过，踩哪几块石头，还得调动地方基层和个人的积极性。所以要加快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使各个方面的增长动能得到释放，使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乔依德：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嘉宾一：我注意到刘老师没有提两个事情，一个是房地产没怎么提，二是政府方面的改革没有太提。我就想提一个问题，房产税已经讲了好几年了，中央到底是要推还是不推，“十四五”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

刘世锦：你提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你问的是中央要不要推，这个问题你没有问对，因为我不知道中央什么决定，我只能讲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的观点是，房地产税应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后，一项基本的制度建设。我本人觉得从长期来

看，中国房地产税还是要搞的。但中国怎样做，什么时候做，现在有很多特别的问题。中央要推的话，应该是统筹考虑这些因素，把条件创造好，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推。我也只能说到这里。

政府改革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提得比较多的热点事件。现在很多政府官员不愿意负责任，不愿意干事，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让他们振奋起来，让他们干事。我刚才讲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包括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放眼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我认为有不少官员很有企业家精神。我们不应当将企业家精神这个词单单用在工厂里的厂长、经理，其实企业家精神指的是一种创新、好奇心、创造力以及执行力等特性聚合在一起的一种精神，拥有这类才能的人在企业中是企业家，在政府则是政府官员。中国经历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不难发现我们有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很有这种企业家精神，把地方经济发展搞得风声水起，当然前提是他有这种积极性。你刚才提到的政府改革，当务之急是让更多具有企业家

精神的官员能够有所作为，能够被放在说话算数的位置上去。中国应当重新振奋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改革精神，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至于这个动能的动力从哪调动起来，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改革，而且改革的进程是比较紧迫的。

嘉宾二：我想问一个关于CPI的问题，现在CPI已经超过2%快到3%了，未来货币政策是不是会转向？如果转向的话，对普通人或者投资人的投资方向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刘主任对拜登上位以后的中美关系走向，或者贸易战的走向有什么样的看法？

刘世锦：据我所知最近CPI不是往上涨。无论是何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目标最后一定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刚才你问拜登上台以后的中美关系，我对中美关系不太懂，真不敢说。我发现现在有关于中美关系的言论很多。我只是感觉到两国现在很难回到若干年以前蜜月期中的那种状态，原因很复杂。但是我认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首先还是把自己的事

管好。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事，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以后，中美关系自然而然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美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实用主义，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行事准则都是实事求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当我们自身强大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逐步解决了，美国的决策者都很聪明，你不要低估美国人的聪明，美国人知道怎么做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

嘉宾三：刚才我注意到你 PPT 中提到几次中央全会，跳过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不知道有没有深层次含义？

刘世锦：中央各个全会都很重要。

嘉宾四：四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这次又把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能，你的演讲似乎遗漏了开放这个问题，不知道关于开放你是如何考虑的？

刘世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相比于改革而言，开放政策其实延续性更好，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的开放进程依旧在大踏步前进。我 20 多年前来过上海，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在这调研，相比过去，我国的

开放进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国目前负面清单多长呢？负面清单为零。这标志着开放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我本人是搞研究的，我提出的观点只是研究的观点，仅供参考。

乔依德：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和回答！下面是茶歇。

演讲和讨论

左学金（主持人，上海市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监事）：各位来宾，我们论坛下半场马上开始。上半场非常高兴听到刘世锦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演讲，听众也跟刘主任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我们下午有四位嘉宾发言，他们分别是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和副院长朱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博士，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刘焜松博士。

我们按顺序，每位先做 15 分钟的发言，主题围绕今天论坛的题目。15 分钟以后，发言嘉宾和下

面的听众之间可以做互动。

首先有请朱宁教授做 15 分钟的发言！

朱宁：双循环的机遇与挑战

朱宁（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非常高兴来到今天的论坛，非常高兴在此有机会听刘老师关于中国经济一些想法的分享，其实每次听刘老师讲都是收获满满，刘老师讲了很多干货，又坚持了很多原则。

本来给我布置题目是讲双循环的机遇和挑战。我先分享一个观点，我这段时间参加了很多关于双循环的活动，每一次我被邀请去讲双循环，如果主办方是国内的主办方，一般都让我讲国内大循环；如果主办方是国际主办方，都希望我讲一讲双循环。对大循环和双循环这两个概念，社会上还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先阐述一下个人的粗浅理解。

第一点，双循环在这个时点提出有两个原因。这个提法既有我们主动的原因，也有整个外部环境

变化的原因。我们主动的原因是中国市场越来越大，国民整体收入逐渐增加，国内自主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底气，有实力。全球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在对国际依赖降到很低的时候，仍然以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来实现自主驱动发展，至于这一进程有多顺利，我们可以再讨论，全球没有几个国家有这个底气可以说这个话。

第二点，也有外部环境压力和限制。有来自于科技领域和教育领域的限制，过去几年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全球对贸易和经济环境不再像过去二三十年这么友好的预期。

下面我谈谈双循环的核心，我个人觉得双循环核心还是应当回到两个大的方面来讨论。在需求端的核心仍然是推动整个国内经济总需求的增长。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逐渐演进的过程中，消费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在 2019 年，我国消费对 GDP 的贡献上升到 58%，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们发展过程中一个高点，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所以我国不只是经

济总量在增长，人均 GDP 在增长，整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推动力也在很顺利和按计划地发展，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从供给端结构改革来看，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提升的需要，中国厂商和中国企业逐渐在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关于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在关键核心领域我们不只要做到不再依赖于国际技术，而且要想办法走到引领全球的位置。

讲到机遇和挑战，我讲四个机会、四个挑战。

第一个大的机会仍然是技术进步。很多人讲过去 100 年人类在科技领域完成的进步，可能是超过了人类过去两三千年的总和。从蒸汽机开始，到后面对于自然的征服，对于宇宙的征服，对于互联网的运用，我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颇具爆发性的增长。时至今日，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AI，都是站在过去几十年技术突飞猛进的肩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国在很多具体的工程领域，已经站在全球前列。如何利用这种巨大的技术进步？我们看到新能源车行业中，特斯拉是一个具有神话气质的企业，但可能马上被中国三个新能源

汽车企业蔚来、理想和小鹏会弯道超车。因为有了新能源汽车，因为有了新能源发动机，我们完全可以绕过传统汽车行业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这是一个巨大机会。

第二个机会是全球化。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的这段时间，全球贸易环境和十几年前相比比较严峻的大环境之下，我认为全球更多国家一定明确体会到了，全球化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经济增长、就业、文化交流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方面都带来巨大的改善。虽然过去这么美好的全球化进程出现了暂停或者一定的退步，但是我认为大的方向和大的战略仍然可以确定。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我们从2000年加入WTO之后，非常快速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仍然会给中国经济的双循环发展予以进一步的促进。

第三个机会，是在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建立了从规模、深度、完整度来看，都称得上绝无仅有的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今年外贸出口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在这

个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在某些领域有所保留，但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非常非常欢迎？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在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受到疫情而中断，有一些外企考虑是不是退出中国，或者多元化其产业链，但是基本上都是说得多，做得少。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以及企业严重依赖现已形成的比较完整和成熟的产业链，同时对于中国大量的有技能的高等技工有强烈的依存。这一局势在今后 5 到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仍然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机会。

第四个机会，每个人都是其中之一，即巨大的高速增长的内市场。正是中国民众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对于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发展的信心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市场，没有之一。我过去两年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论坛时听到很多说法，会不会有一种所谓去全球化，或者更具体的是去中国化的趋势？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是有一定的影子，我和国内同事分享了一些观念，大家认为其他国家更多倾向于中国 +1，并不是要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希

望在中国市场和中國生產能力之外形成一個備份，或者形成一種新的對沖機制。但是我認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大型跨國企業在當前可以離開中國這個巨大市場。

接下來我也講四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關於房價和房地產市場。我前幾年出過一本書叫《剛性泡沫》，資產泡沫是對整個經濟的資源錯配，體現在對消費市場的擠出和擠占。如果從10年前的價格來看，中國房價和當時收入水平相比有點高；從5年前來看，房價或者房地產作為一個金融資產和它的基本面即房租相比有點高；時至今日，全球基本形成一個共識，中國房價從絕對水平來講，已經在全球處於前列了，即一平米房地產價格已經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回到最近講的“房住不炒”這一中央的國策，我個人仍然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有大量投資性和投機性需求，而不是住的需求。如何比較有序穩定地化解這個泡沫？前几天我在鳳凰財經年會有一個對話，資產價格如果超過基本面價值過高的話，基本上最終結果是均值回歸，這個回歸是以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美国股市和楼市急剧下挫的方式，或是以其他方式，还很难讲。但是从过去 100 年的金融历史，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种资产的基本面价格远远背离基本面价值，而不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所以，这仍然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财富分配不均。经济学家一直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获得效率一定要牺牲一定的公平，如果要获得更多公平可能一定要牺牲一定的效率。大家可能感觉到，尤其在座各位可能都是过去 40 年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就是侧重效率的受益者。但是注重效率的结果是，尽管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但仍然有 1 亿左右人口的月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 1 千元人民币，这些都是贫困人口。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稳定，大家如何更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祉；另外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大量的收入不均会影响今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对于广大的低收入阶层来讲，想要提升自己收入水平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其消费边际倾向非常强，甚至多赚 100 块钱就会将这 100 块钱全部花掉。对于中高收入水平的人来说，生活必备的

东西都已经有了，赚了1万块钱他会都存到银行里。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另外两个挑战，我们知道存在这两个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两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我只把问题提在这，供大家思考。

第三个挑战是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一个快速、严重的老龄化进程，我们在进行人口普查时，不同的专家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有不同的看法。在上海还明显感觉到少子化趋势，人群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导致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大，今后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每个年轻人所要担负的责任和承担养老金的义务也会越来越重。没有人知道这个趋势有多快，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量按照世界经合组织的预测只有7个亿。刚才讲中国巨大城市、巨大消费市场、巨大劳动力这些优势，随着今后这几十年老龄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很明显的逆转，而这些不利条件对于经济发展会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最后一个挑战也是我思考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债务。今年因为疫情，全球各国的债务都出现了明

显的上升，但是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债务水平的增长速度还是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一方面和我们政府的投入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们过去这十年采用基建和房地产刺激经济的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有一定的关系。刚才刘主任非常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也比较委婉地表达我的想法，作为金融学教授，对一些很支持进一步提升债务水平的专家，我会说：衡量债务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所欠的债务是否还得起。

我特别同意下一阶段改革要更加注重新的高质量的发展。对于环保，对于财富分配，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改善，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也将会帮助我们克服人口老龄化甚至是少子化带来的人口数量下降过程中所存在的挑战和问题。谢谢大家！

左学金：谢谢朱宁教授，四个机会，四个挑战，给我们看到乐观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面临的挑战。他提出挑战包括房地产、收入分配、消费、老龄化、债务问题。接下来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做 15 分钟发言，主题是“对双循环下内需问题的几点思考”。

万广华：对双循环下内需问题的几点思考

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首先很高兴和刘主任和其他专家一起参加这个会议，特别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尤其是我们乔老师。

我在这个平台已经演讲过好几次了，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 2010 年，我讲的是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当时争议很大，大家都反对，乔老师说你继续讲，当然现在大家都接受了。讲城市化问题有一个背景，我在 2009 年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中国要增加内需，增加内需最重要就是把城市化做好。两年前我在发展研究基金会又做了一次报告，当时反对声也比较多，我讲逆全球化，目前尚允许存在争议，我们还需要等 10-15 年再看看逆全球化。今天我谈双循环，双循环我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就是无可奈何。因为中国在逆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很多，如果继续在全球化中与全球主要国家对立，未来引发的不只是市场问题，还有技术问题、就业问题以及外汇储备的问题。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逆

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意识到国际市场风险正在上升，至少中国经济高度依靠国外市场所蕴含的风险很大。我个人观点认为，逆全球化和中国被脱钩的局势很难扭转，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的观点。

首先解释一下我对双循环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双循环，我的题目是讲双循环的需求，中国为什么做双循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一直两头在外，即技术和材料以及市场在外。我们要做双循环，其实就是强化国内创新，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但是创新问题早就提出来了，提了好多年，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就已经提出创新的问题，其实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及。我的意思是今年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在内需上，当然内需要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我讲关于内需的五点思考。

第一个思考。我们谈到双循环增加内需的时候，这个概念还要把它搞明确。至少从研究角度来说，我们经济学界有一组人专门研究国内消费，而且国内有一个期刊叫《消费经济》。我的疑问是，

你们究竟要如何增加消费，真的只是提升消费水平吗？当然提升消费水平是对的，因为 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1 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 千多美元。按照 2017 年储蓄率来说，人均消费只有 2 千美元，这确实是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发展这么多年，人均消费才 2 千美元。如果看双循环，只是简单增加消费的话，是有问题的。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是要促进供求缺口缩小，所以双循环真正要做的是把消费能力提高，不只是简单增加消费，如果增加消费，但是民众的收入水平不变的话，这并不能体现双循环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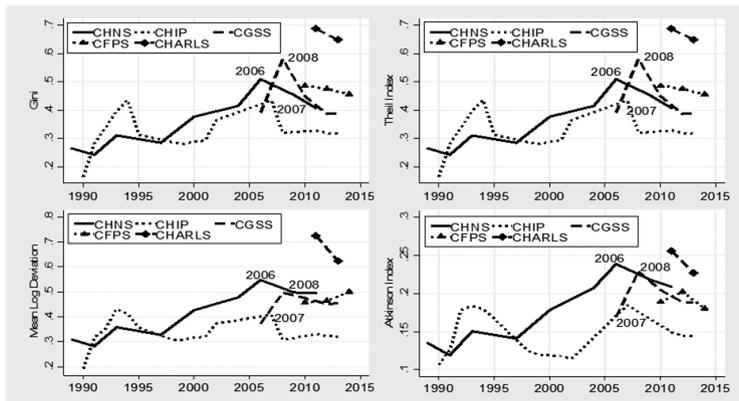
第二个思考。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要通过增加收入来增加消费，但仅仅靠增加收入来增加消费解决不了双循环的问题。我们国家 40 年的经济增长历程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社会进步也很快。但是因为我们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增长却很少，今天才有了这样一个供求缺口的问题。我们过去很多年通过国际市场化解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要从内部挖掘市场潜力以解决缺口问题。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分子、分母两方面

问题的解决。

第三个思考。要增加收入，问题在哪里？关键在于增加谁的收入。增加收入是对的，但是不能一般意义上的增加收入，如果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增加总收入，将不可避免给国家层面带来更大的不均衡。真的要做的是增加穷人的收入，因为穷人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有很多研究通过降低不均等、降低贫富差距来增加中国消费。我本人刚刚回到国内做的第一个报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那时中美摩擦还没有发生，我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早晚要爆发，我到现在还是这么一个观点，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报告中我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内需上，一定要拉动内需，这是2年前在这里讲的。问题是我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只对一半？给大家看几个图。

图1来自《劳动经济》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我们做了不同数据，不同指标，中国的收入差距过去10多年一直在下降。但是我们国家的内需始终没有上来，简单说，通过降低收入不均等带来消费增加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政府长期支持农村，2003年起开始反哺，不均等在下降



但失衡仍然严重：2019净出口=11%GDP

图 1：不均等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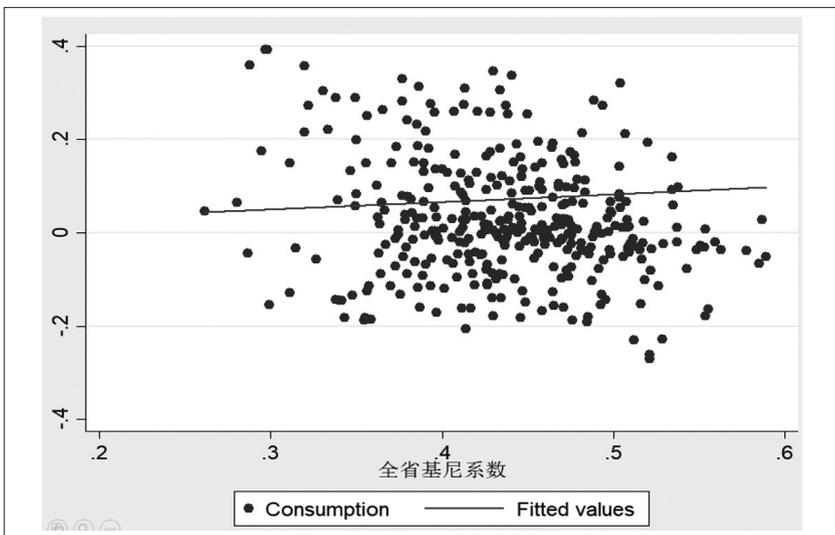


图 2：国内消费与泰尔指数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如图 2 所示，我们可以将基尼系数作为判断国内贫富差距的指标，将基尼系数和国内消费画一个简单的图，它是正相关的，即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消费会增加；贫富差距缩小的时候，消费会减少。如图 3 和图 4 所示，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国内消费与城乡差距，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我们将国内消费按地域分成两部分，把消费跟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的差距画一个图（图 3），发现收入差距和消费是负相关的，即降低收入差距就能带来消费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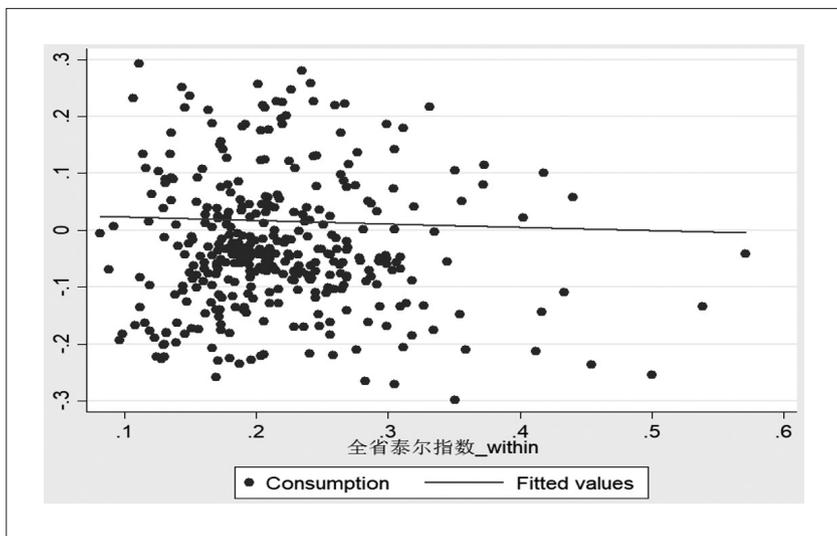


图 3：国内消费与城乡内部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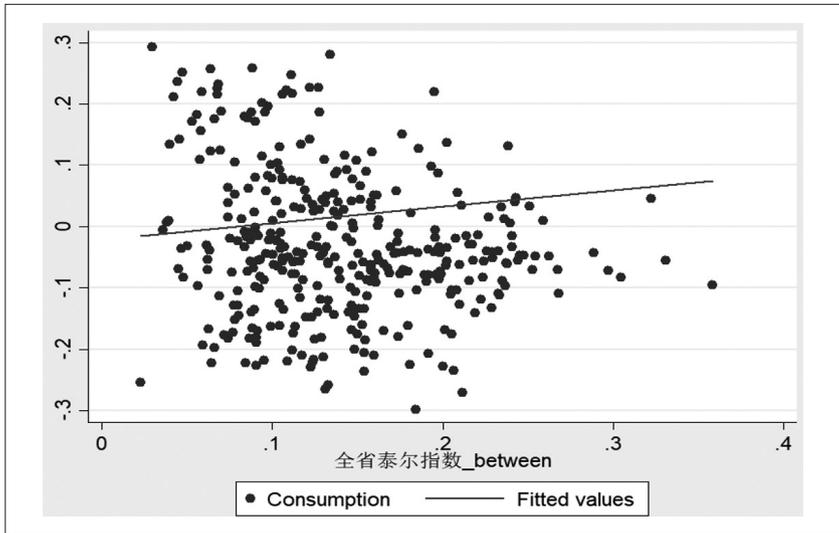


图 4：国内消费与城乡差距

但是，如果将国内消费跟城乡差距结合起来讨论（图 4），将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城乡差距跟国内消费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个道理其实挺简单，基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农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 10 个百分点。中国真要去推动双循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还是要推进市民化，要把城乡化的相关问题解决，不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是不行的。

第四个思考。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一直被垢病有三高，即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投资很高，不少人讲我们不能再靠增加投资来促进

经济增长，我对这个有点看法，不一定对。我本人不是做投资的，我分享一下我的观点。一方面是中國对投资有没有需求，我要说的刘主任也提到了，中国城市化率 60% 出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将达到更高的水平，对房地产的需求是巨大的，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另一个方面是外资投入，外资基本上由市场来驱动，今年在这么严重疫情下大量外资进来，说明在中国还是有投资空间的。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会越来越地偏向资本。然后是看有效投资，中国很多投资是无效的，这里面当然有体制机制的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归根到底，我不要投资是看资本的回报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别。我们早期的回报率很高，能保持在 20% 之上，现在降到 15% 左右，未来可能继续下降至 10% 左右。但是 10% 的回报率就不投资了吗，已经亏本了吗？这个要跟利率来比。全球利率不断走低，日本和欧洲有些国家的利息已经是零了，美国是接近零，中国资本回报率为 10% 的话，为什么不能投资？当然我不主张盲目的投资，要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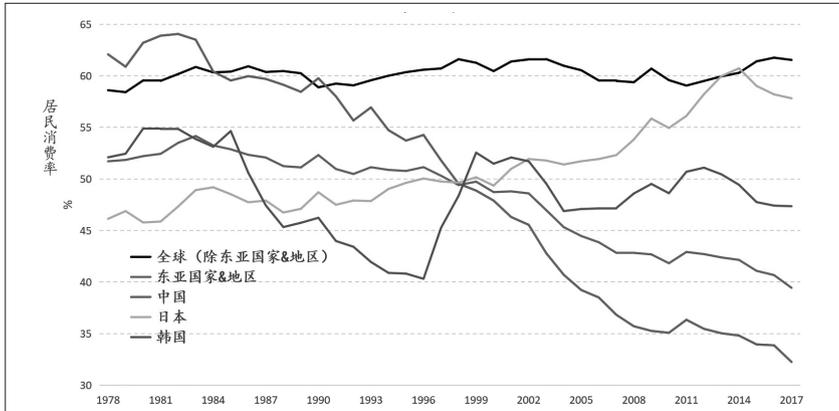


图 5: 全球各国居民消费率

最后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除了前面说的体制机制问题，双循环面临的挑战非常非常大。我们看图 5 中各国的消费能力，黑色的是全球（除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值，徘徊在 60% 左右，灰的这条线是东亚的，包括中日韩、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之间的差别又是巨大的，中日韩三个国家，红色代表中国，消费力极低，我们国家有这个问题，因此更需要依赖国际市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增加消费，增加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人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够，社会福利不够，所以有预防性需求。为什么南韩储蓄率也是那么高，而消费那么低？除了体制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文化

原因，东亚民族喜欢储蓄，全球 10 万亿外汇储备，东亚的中日韩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占了其中的 6 万亿，咱们国家就占了 3 万多亿，所以双循环的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小结，从我的角度来看，双循环的关键是增加国内需求，包括增加有效投资。增加内需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包括逐步消除城乡分割，即市民化的问题，现在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数量的 40% 出头，还有 20%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关于消费力的研究还很欠缺，中国要解决双循环问题，要聚焦消费力，所以需要我们去关注它，学术界要研究它。谢谢大家！

左学金：刚刚万广华所长强调消费，也讨论了我们投资的问题，还联系了东亚国家。我感觉需求很重要。朱宁教授要先离开，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提一下。

提问者一：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你刚才说债务的好坏要看是不是能还得起，中国这么多年宏观杠杆率 200% 多，所以才有去杠杆。但是从另

外一个角度，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需要钱，但是又受到发债的限制，你认为我们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大规模发行政府债来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从而摆脱对土地的依赖？

提问者二：朱教授，非常感谢！我提的也是关于债务的问题。咱们国家没有什么外债是一个共识，现在既然有那么多债务，那谁是这些债务的拥有者？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有人欠债，有人拥有这个债，到底谁是债主？

朱宁：首先感谢左老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互动。

第一个问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讲，中国无论是债务水平还是债务率以及赤字率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开前门和关后门，或者开前门堵后门，我们一直做地方债置换，希望对地方政府举债有更强的问责机制，有更强的压力和责任，所以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基于整个地方债务，无论是现在的水平，还是 250% 的较高水平，或者是民间预测的 270% 的水平，所描述的都是显性债务，背后还有潜在的债务，或有的

债务由地方政府承担了担保义务。地方政府应该被允许和鼓励更多的举债方式。更核心的问题是还债机制，如何能够在地方和中央之间把法律权益分清楚。美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两次债务问题中，有7个州政府宣告破产。如果没有一个足够有威胁力的说法，目前环境下很难说服地方政府以更审慎的态度举债，这是整个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核心。

回到那个谁是债权人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金融机构资产并不一定是由金融机构自己来持有的。从这一点来讲，我经常替我们金融行业辩护，虽然很多问题的表象是金融没有很好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最后还与深层次经济结构有关。

回到债务，如果不能够打破刚兑的限制，最有风险辨别实力的是最精明的私人投资者，而最后持有债务资产和承担风险将会是政府。

左学金：谢谢朱宁教授的回答！

接下来第三位发言的是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主题是“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花长春： 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

花长春（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谢谢左老师、乔秘书长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今天我的汇报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短期的关于明年经济增长的问题。二是双循环下关于人口的问题，此外再回应一下万老师关于消费力的问题。

首先短期。海外经济今年有非常明显的现象，疫情之后全球居民储蓄大幅上行，这一现象是之前是没有看到的。中国前三季度新增储蓄 10.3 万亿美元，正常是 5 万亿美元。欧洲各国的储蓄也大幅上升，从之前的 1.3 万亿美元上升到 2.5 万亿美元。因为全球服务业没有办法消费，再加上财政补贴，从而导致买房买车，买各类商品的消费非常强劲。加上海外产业没有恢复，所以中国出口非常强劲，当前中国经济大超预期，核心原因跟出口有关。

往后走，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储蓄已经形成，我们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在制造业投资和消费提升，尤其是消费力的提升。我们经常提到一

点，在上海有大把买名牌包的人在那排队。这次我们在三亚开会，免税店几乎是人满为患。出口在明年上半年依然会不错，消费也会持续回升，预计明年全年经济增速 9%，明年经济的确会是不错的。明年上半年在消费出口和库存周期的带动下，制造业全面修复。下半年重回 2019 年下半年的趋势，新兴行业增加投资，全球 ICT 行业会增加投资。我们在 19 年下半年调研发现，机器人订单增速达 30%，从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将会延续。房地产行业预计在中央三道红线的约束下，去杠杆、去库存将会是下一阶段的主题。今年整个基建行业的表现低于预期。我们做了大量地方调研，地方政府在不以 GDP 为考核目标的时候，整个目标体系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地方政府做政策时会受到市场的牵制，并且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因为债务终身责任制，没有人愿意担负这个责任，又是搞环保，又是去杠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的确发生了变化，和 2008—2009 年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中央一声令下，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搞钱搞基建。

接下来一段时间，经济恢复的主要动力还是在消费这一块。随着疫苗出现，明年上半年疫苗逐步推广，到明年2月份全球经济开始逐步恢复。我们也发现整体上库存水平是非常低的。当前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从14%上升到18%，上升了4个百分点，如果这4个百分点都是替代别人的，它占我们出口的比重是多少？大概占25%左右。我们现在出口增长的部分基本上来源于替代的看法，我感觉不太可靠。测算结果表明，全球贸易总额是下降的，全球贸易增速也是下降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估计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中上升的原因有二个，一是替代别人的，二是自身的正常增长。我们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5%，经济恢复将对我们的出口带来一定的正面作用。

明年政策到底会怎么样，这跟通胀有关系。我们在11月通胀数据出来之前写的报告中提到，明年上半年经济会持续恢复，会出现一个温和的通胀。如果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原油价格上升到60美元的话，明年CPI会达到1.6%的水平，全年CPI

在 2% 左右，最高点将在明年二季度出现，大概是 3.6%。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预计明年货币政策是降稳量控的格局。明年 3 到 5 月份，央行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政策空档。财政政策刺激会逐步退出，由今年的 4% 左右回落到明年 3.5% 的水平。我们预计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也会下降。

在资本市场，我们认为国际大宗商品表现不错；股票总体处于振荡区间，很难有一个特别好的行情；债券市场基本上上半年也是处在振荡区间，很难在通胀和经济都保持稳中向好的情况下出现特别好的行情。这是关于短期经济的情况。

后面我主要讲述一下对双循环政策的主要想法，核心还是说一下消费这个问题。刚才万老师提到消费力提升，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到底是以提高收入来提高消费，还是以提升消费率来提升消费？万老师提了一点，如果从公平角度来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提升，无论是对提升消费率还是提升消费都是有利的。提升消费率就意味着降低储蓄率。我们注意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应当重新思考消费率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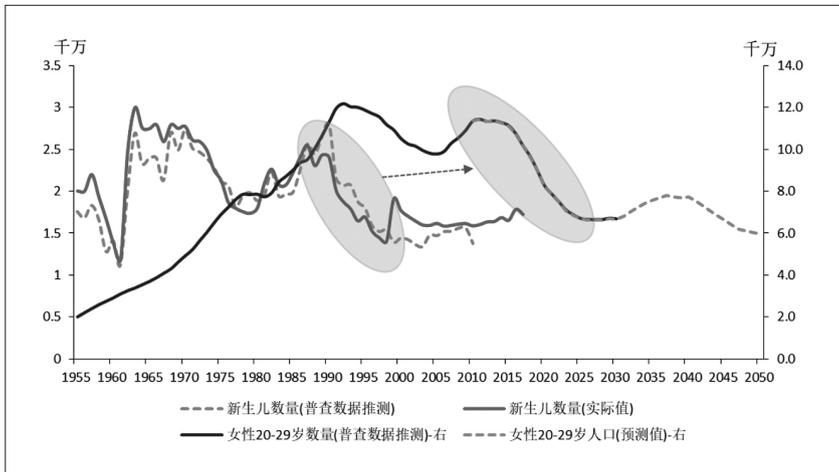


图 1：中国新增人口变化趋势

如图 1 所示，红线是我国出生人口的周期变化，可以明显感觉到 60 年代到 70 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波婴儿潮，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出生人口急剧下降。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是 1978 年出生，我们这一代开始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使我国的人口高峰降了下来，但是人口周期并没有改变，所以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生人口进一步上升。大家可以看一下 90 年到 00 年这一段，受 70 年到 80 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90 年到 00 年的新生人口也呈现出下降趋势。此后，人口周期逐步向下平稳。为什么这几年人口出生率急剧地往下走，并且预计未来这

几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还要继续往下走？因为 90 后将进入到生孩子的年龄段。现在的 90 后不愿意结婚，晚婚晚育成为了实际。我经常讲，90 后即将肩负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任务，那就是要生孩子。如果 90 后都不生孩子，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会更加糟糕。一方面，人口拐点会提前到来，2025 年就会出现人口高峰期。最为糟糕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急剧上升，我们在未来 5 年到 10 年期间，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急剧往上走，而 20 到 50 岁的人群每年会下降 1 千万。无论是从生产能力还是从消费能力上看，20 到 50 岁是最为旺盛的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群体的急剧下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问题。同时，会出现一笔很大数目的养老负担问题。当前财政的公共预算补贴在养老上每年要补贴 2 万亿人民币，如果财政体系不变的话，到 2030 年每年的补贴要达到 8 万亿到 10 万亿左右，这在实际上是财政不能负担的。

第一，在这个期间，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财政负担会很重，能不能通过福利制度改变我们消费力呢？基本上非常困难，目前对此的政策是延迟退休

年龄。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实行 70 岁退休，再加上卖一些国有资产，中国差不多能缓解养老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要做好更晚退休的准备。一方面 90 后年轻一代多生孩子，另一方面工作年龄群体多工作几年，才能解决人口的问题。再谈一谈消费力提升的问题。参照历史经验来看，只要人口还没有负增长，在人口老龄化期间，我觉得消费力基本是明显提升的。未来我们应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还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消费率本身不应该成为核心的政策指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万老师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我认为，一方面应该考虑到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我国的人口结构，针对提升消费率这个难题，我们能够使用的工具是相对有限的。

第二，经济结构本身就会有一个消费率提升的问题。中国消费率是在逐步上升的。另外，我建议不要过度刺激年轻人消费，因为年轻一代消费率比我们这代人高很多，比我们的上一代人高更多了。未来一段时间，人口和收入的生长的确可能对中国的消费形成很大的支撑。我们认为未来的消费问题

根本不需要去担心，所以内循环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这个时间段必然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企业投资和市场投资一方面应该更多倾向于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另外一方面应该倾向于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的大健康产业。

未来一段时间是经济增长、文化复兴、民族品牌崛起的伟大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支撑中国的消费，这和日本的经验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还是应该通过各种方法去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另外一方面不要过度鼓励年轻人消费，因为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上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总而言之，核心还是要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去解决问题。

谢谢！

左学金：非常感谢！花博士刚刚谈到了短期的经济未来，也谈到了长期的经济问题。短期上，他强调了疫情造成的负面效应，预计未来的动能在制造业投资和消费提升，也解释了我国出口强劲、经济大超预期原因。他提出长期面临的问题和他在日本长期留学有关，比较多地从人口问题考虑。人

口确实对经济有一个长期的影响，包括生育政策、养老等。等一会儿大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第四位嘉宾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刘焜松博士，他谈的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主题——“对我国房地产现状和走势的分析”。

刘焜松：对我国房地产现状和走势的分析

刘焜松（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乔秘书长，他每年都给我打电话，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几年比较忙没有参加，之前我都是参加的。也要谢谢我的老领导左院长。

今天讲一讲大家关心的问题——房地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里的利，也就是财富，大家知道它的根源吗？财富的爸爸和财富的妈妈分别是谁？财富的爸爸就是劳动，财富的妈妈就是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经有关机构的测算，现在用美元计价的全球财富总额大概是 340 万亿美元，其中 50% 是住宅，

如果加上商业用房和办公用房，大概是 210 万亿美元，这也是不管你是做什么的都需要关注房地产的原因。

今天分四点讲一讲。

第一，简单地讲一下今年 1 到 10 月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概况。主要是住宅面积基本上持平，房价继续上涨，今年新房销售价格涨了 7.36%，竣工面积是在下降的。

指标	绝对量	同比增长
住宅销售面积	11.8092亿平方米	0.8%
住宅销售金额	11.7923万亿元	8.2%
新房销售价格	9986元 / 平米	7.36%
住宅竣工面积	3.5443亿平方米	下降7.9%
住宅待售面积	2.2268亿平米	下降0.5%
住宅施工面积	62.1836亿平方米	3.8%
住宅新开工面积	13.2481亿平方米	下降2.6%
土地购置面积	1.7775亿平方米	下降3.3%
土地成交款	1.1386万亿元	14.8%

图 1：2020 年 1—10 月份中国房地产市场概况

第二，主要从几方面来看 2021 年房地产的展望。首先看估值。现在关于房价的争议很大，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走势怎么样？房子跟一般的资产

市场比如股票不太一样，因为股票没有消费的属性，而房子有投资的属性，也有消费的属性，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从投资属性来看，主要看住房的出租收益率，目前统计下来大概在 1.5% 到 2%，但是现在的无风险收益率在 3.5% 左右。考虑到住房具有消费属性，很显然房价是偏高的，因为出租收益率太低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来要使出租收益率不进一步地下降，就要将租金上升。

如果从消费品属性来看，主要通过房价收入比来看。我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全球最高的国家，现在我国新房平均房价是 1 万块钱 1 平方，与美国基本上划等号。这还没有考虑到美国的 1 万块 1 平方是精装修房，另外我们计算用的是建筑面积，美国计算用的是使用面积。但是美国的人均 GDP 是我们国家人均 GDP 的 6 倍左右。很明显我们房价收入比是严重偏高的。

还有从宏观来看，常用来衡量房价的一个指标是住宅市场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目前的住宅市价总值测算下来为 320 万亿人民币，与

GDP 比例差不多 320%，美国 2018 年的这个数据为 126%，日本是 208%，美国这个比例的历史均值是 102%。房价总值跟 GDP 基本一致，这才是很健康的比例。日本曾经出现很严重的地产泡沫，1991 年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而在 1955 年到 2008 年 54 年中，这个均值也只有 187%。所以从估值来看，我国的房价肯定是偏高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价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供求关系，那么供求关系现在到底怎么样呢？首先要看人口，2019 年我们死亡 998 万人，出生 1465 万人，实际上人口还是在增长的，净增加 467 万。刚才大家谈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问题，这里我跟主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老龄化不是问题，或者说老龄化没有那么严重。全世界的老龄化是由于人的自然寿命在增长，而统计数据则刻舟求剑，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二三十年前说 60 岁以上是老人，这个是对的，但是现在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比如左院长今年 70 岁了，身体还是特别好，乔秘书长也 70 岁了，身体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认为现在的统计数据要改一改，将

现有的标准平均上移十岁，70-75岁才算作真正的老人。回到前面，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这对房价肯定还有支撑的作用。但是婚龄人口确实从2018年、2019年开始下降，明年到2023年这连续三年都将是大幅下降的阶段，可能会对住房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快速发展中，去年的城市化率是60.6%，今年预计是61.6%，增加一个点，明年会继续增加1.2个点。但是供求关系的需求中，有一块是弹性非常大并且没有办法估量的，我把它称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0平方，城市只有36点多平方，农村高一点是45平方，但是美国的人均居住面积是64平方，日本是46平方。我觉得日本是有参考意义的，因为日本的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面积与我们比较接近。我们与美国是没有办法对比的，美国地多人少，人口密度比我们低很多。假定中国将来城市里有10-12亿人口，人均居住面积增加1平方，就是增加10到12亿总需求。我们现在人均居住面积毕竟只有30

几平方，而且中国人攀比的心理、从众的心理是非常严重的，不论家里有钱还是没钱，看到别人住大房子，一定要想办法也做到，即使负债也要买大房子，觉得不买特别没面子，这种心理也会强化对住房的需求。既然有需求，那么居民有没有过美好生活的实力呢？据统计，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存款是 91 万亿，今年 1 到 10 月份整整增加 10 万亿，而居民手里不单是储蓄存款，还有基金、债券、股票、信托等等，这些统统加起来，我估计老百姓手里的金融资产应该有 130 万亿之多。而我们一年的房地产销售收入也就十几万亿，这说明是有实力的，但是这却很复杂，与文化、与国家政策的引导等等都有关系。

从供给来看，土地全部由国家供给。现在住宅市场供给的存量是 320 亿平方米，房地产商一年能建造的面积大约是 15 亿平方米。到 2020 年 10 月底，我国在建的住宅实际上 97% 都已经卖掉了。2000 年到 2020 年 10 月，住宅销售面积合计 176.4611 亿平方米，竣工面积 116.3816 亿平方米，也就是说，已经卖掉的房子中有 60 多亿平方米还

没有交房，而现在住宅的施工面积正好是 60 多亿平方米，这两者间大概差了两亿，我估计这两亿平方米已经在建了，只是还没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没有领到预售证。所以，目前所有新房实际上都卖掉了，房价怎么跌呢？从供求关系来讲是蛮难跌的。供求关系最重要两个因素，一个是政策，一个是投资者，或者消费者心理。现在最大的政策就是房住不炒，稳房价，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但是房地产不是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了，它就是经济本身。目前广大的住宅市值是 300 万亿人民币，我们 GDP 只有 100 亿人民币，这个比例是 300%。房地产好，房地产稳定，中国经济就不会出问题；房地产不稳定，中国经济必然出问题；房地产经济出大问题，中国经济一定出大问题。

我认为，在供求实际上比较失衡的情况下，银行政策应该更多地支持供给，在这里就是应该多建造房子，满足居民的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的政府政策正好是相反的，一直限制将贷款资金留给房地产商，而是将资金留给需求者，如果你要买房，可以

马上拿到钱，但是如果你要建房，就只能发债券，或者通过信托拿到资金，因此我觉得银行对房地产的政策有点问题。这么多年来，房地产商拿了这么多的信托与债券的资金都没有出大问题，银行把这个资金给他们会出大问题吗？根本不会。因为信托的资金要比银行的资金利息起码高出 2 到 3 个百分点，这种高利率的资金下都没有出问题，低利率的资金怎么会出问题呢？

货币政策对 2021 年的房价有一定负面的影响。现在应该说比较明确，也基本达成共识——明年经济越好，稳杠杆率或降杠杆率的概率越大。因为今年的 1 到 10 月份投放了 20 亿贷款，财政方面多投放了 3.6 万亿资金，所以经济恢复以后，肯定是要收缩的，否则风险太大了。

再看利率政策。全球现在有三大超级泡沫。第一是最容易破的，就是美国的股市，是全球最大超级泡沫，也是最脆弱的一个超级泡沫。第二大超级泡沫是全球多个国家的债务，但是这个债务不是只有中国杠杆率高，而是全球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杠杆率都很高。还有中国房地产市场，这是全球三大超

级泡沫。这三大超级泡沫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利率只可能是低利率，如果有升利率的趋势也是短暂的。全球实际低利率、全球名义低利率、全球实际负利率、全球名义负利率都可能长期存在。财富在安全 and 国家稳定面前一定是要让步的。现在这三大泡沫真正大到大而不能破，所以我觉得它们都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当然其中最刚性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它虽然偏高，但是它不太容易破，因为我国土地供给只有一家，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土地调控来加以控制。另外由于我们的央行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可以收储，我们都知道，重要战略性品种可以收储，铜、粮食都有国家战略储备，房子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国家储备。

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地方政府的内心肯定是希望房价上涨，地价上涨的，因为这样土地出让金就能增长，地方政府才能保证足够的财力。但是美元贬值的影响也是蛮大的，美国的流动性在这一两年泛滥得太厉害了。周小川行长曾经给过一个数字：从 2000 年到现在，中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了 9.6 倍，但是如果按这个时间段来看美元的投放，

增加了 9.5 倍，和中国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中国的投放主要是以前一些年，外汇储备都是被动投放，而美国的投放主要是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所以美元贬值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老百姓心里的赚钱效应还是非常强烈的，买房吃亏的人屈指可数，买股票亏钱的比例远远大于买房子亏钱的比例。在这个赚钱效应下，居民买房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

再有就是国际经验。从长期趋势来看，从国家层面来讲，只有一个国家房价调整超过 10 年，就是日本。从美国 100 多年的历史——1890 年到 2013 年，123 年当中，美国房价年均上涨 3.07%，同期美国 CPI 年均上涨 2.82%，因此房价确实能保值甚至增值，住房作为一个保值的工具是没有问题的。

不确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美联储会竭尽全力维护这个泡沫的，如果美国股市泡沫破掉，不知道会对全球产生多大的影响，总之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台海的问题，现在的局面有点僵。

总的来讲，我国的房价肯定是高的。根据前面几个因素的综合，我估计 2021 年房价还是以平稳发展为主，涨可能会涨一点，但是幅度不会大，城市之间会分化，好的城市，好的地段，好的房型房价是不会下跌的。

最后稍微谈几点建议。

第一，我做研究的时候，找不到关于住宅的数据，比如全国到底有多少面积的住房，到底有多少套的住房，一房的有多少，两房一厅的有多少，三房一厅的有多少，每个城市的分配是多少。我认为这个数据对国家制定房地产政策非常重要，如果国家不掌握这些数据的话，我建议应该要普查。如果掌握这些数据，建议应该公布出来，让每个研究者都能使用它，发挥它的积极意义。

第二，增加一线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价格最终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没有供给，再怎么压需求，都是没有用的，而且有这么大的赚钱效应，怎么能抑制住这个需求。

第三，盘活农村宅基地。现在农村宅基地的浪费实在太严重了，我国的住宅面积总共才 300 多亿

平方米，而农村宅基地有 1860 亿平方米，以我的观察，这么多的宅基地中大概 60%—70% 都是闲置的，或者使用率很低。

最后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尽快要取消掉，二孩政策已经放开了，三孩也要择机尽快放开。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互动讨论

左学金：感谢刘焜松博士做了非常精彩与深入的分析。未来由于货币宽松政策，估计房价上还是会分化，有的城市会跌，有的还会涨。关于宅基地我说一句，我们国家现在宅基地很多，但是有房地产开发价值的只是大城市周边的宅基地，偏远山村宅基地可能很多，但是没有开发价值。

刘焜松：怎么置换出来？

左学金：在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置换，卖掉就卖掉了，卖不掉就卖不掉。我们国家因为是计划经济，所以像重庆那样要搞地票，地票实际上只用了一部分，因为工业土地是不用地票的。我们国家土

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土地用在工业，很少的土地用在住宅。有的地方用于住宅的楼板价可以是用于差不多地段的商用价的好多倍，所以上海有过商住两用房。但用商业用地做商住两用房，又被政府禁止。为什么地方政府会多做商业用地呢？因为商业用地有税。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像企业一样，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会出问题，因为政府和企业是不一样的，所以好多问题是要非常复杂的。

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简单地说，你认为 70 岁很健康，不能算老龄。但是几岁拿养老金呢？男的 60 岁，如果是体力劳动是 55 岁；女的是 55 岁，如果体力劳动是 50 岁。如果延迟拿养老金，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刘焜松：推迟拿养老金肯定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左学金：新人新办法也不是很容易的。国家人社部 2017 年出的一个方案，要出台 5 年以后执行，但是现在 2020 年也没有看到延迟退休的方案。我们可以健康地活，但是我们也要健康地享受。所以这个问题也蛮复杂的。

大家有没有问题？

提问者一：关于房地产，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中国土地搞的是专卖制度，所以房地产没有泡沫。在专卖制度下，怎么会有泡沫呢？比如烟草的成本是一包烟一块钱，卖到 20 块，能说它有泡沫吗？没有泡沫。因此中国房地产是政府专卖，不能说泡沫，也不能套用西方的逻辑去讲，我就讲这么多。

提问者二：我也是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对很多房地产政策是比较关注的，比如今年出台三条红线的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对房地产商有哪些影响？未来对房地产投资者或与房地产金融相关的投资到底有哪些影响？

提问者三：我来提一个关于货币供给的问题。通常说房地产价格上涨、很多东西价格的上涨是因为政府发了更多的货币。实际上从 2017 年到现在，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来看，一个是外汇占款没有增加，再一个是资产规模并没有扩大。我们未来货币投放还要继续宽松，这几年主要是靠中期借贷便利和降准来做的，现在降准主要降到 9% 左右，继续降的空间不是很大了。那么，未来中央银行货币

调控应该往哪方面发展？

左学金：居民部门的负债从 19% 左右现在增长到 60% 几了。

花长春：要看地方，平均看下来是这个数字。

提问者四：我有一个关于医药的问题想问花博士，目前医药的状况是政府想要集采，要走社会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医药产业还怎么有比较好的发展呢？

提问者五：我们今年一直在提双循环，双循环一个是内循环，一个是外循环，但是关于外循环，好像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所以资本市场更多地关注内循环。但是关注内循环的时候，发现消费就是喝酒，除了喝酒没有什么其他消费了。对于明年，或者对于未来来说，我们双循环会一直走下去，难道说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了，对其他方向有没有指导或建议？

左学金：我不知道酒精消费占 GDP 百分之多少，但是医疗是占 6%，教育占 4%，老龄化的消费也会占比较多的比例，我觉得都比酒精消费多一些。你这个问题是对万教授的吗，你的问题是除了

酒还有什么可以消费？

提问者六：我是替朋友问的，有关 2021 年企业税方面的一些改革，因为之前一直有这方面的意见，所以想了解一下。

刘焜松：关于房地产，刚刚有一位表明了一个观点——中国的房地产没有泡沫，因为是专营的。这个我前面也提到过了，土地是国家供给的。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房价跟世界各国来比，无论从哪个层面，跟我们的收入比也好，从投资属性、消费属性，还是从宏观的估值来看都是偏高的。你认为它是不是为泡沫，这个不重要。因为我的结论也是短时间房价是跌不下去的。

但是中国的房价不是永远跌不下去，刚才我重点讲的是 2021 年，我认为将来房价是要跌下去的，但是没有那么快。按现在一年建 15 亿平米的速度，实际上只需要 15 年的时间，就能建到大概 460 亿平方米。这个数字里是不是包含小产权房还不确定。上次我看到一个数据，我国大概有 60 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如果加上这一部分，就是 520 亿。那个时候即便有 12 亿人生活在城市里，人均居住

面积也是相当可观了，再加上 10 年以后人口总量肯定比现在少，人均居住面积更加可观，那时候房价要稳定我觉得是蛮难的。所以房地产长期确定不看好，我只是说在 2021 年估计跌不大下去。

还有一位问到关于房地产商的政策，那个政策初衷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怕房地产商负债太多，还不上钱，把银行拖下去，第二个初衷是让房地产商把囤积的土地尽快开发出来。你还问到房地产股票的投资。房地产股票从价格跟估值来看，短期肯定极具价值，有的市盈率有 5 倍、6 倍、7 倍，也像前面说过的，如果看得更长远一点，就真的不太好说了。

花长春：关于房地产我补充几个事情。首先是关于投资的事情，三条红线对于房地产的影响。房企怎么赚钱？一个是杠杆，一个是毛利。毛利一般是指楼板价减除费用和地面价，现在基本毛利和净利都在下降，因为利润被政府管制。三条红线是管杠杆，是被央行管。房地产行业的净负债率在 2008 年是 60%，2014 年大概达到了 120%，现在是 160%。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行业主要靠自

我消化，也就是刘老师提到的自我出清。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把土地库存开发出来，竣工，再卖出去，基于目前主要政策的导向，到明年年底左右，总的库存，包括土地库存区划，大概3年左右基本上可以实现正常的运行。所以明年房地产企业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去自我出清的。

到了明年下半年，往后年走，从股票价值上看就会更加明显。因为那个时候完成出清后，有一些龙头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这需要时间。后面关于房地产的REITs也会推动，这也是投资的一个点。

关于货币政策这一块，其实中国在放水，对于M2的供给，要么是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要么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海外是通过央行扩表，希望商业银行进行传导。中国是央行不扩表，但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贷款。不论是中央银行放水，还是商业银行放水，最终都会反映在M2上，从M2和债权融资这两个指标可以看出究竟放了多少水。

关于医药行业这个板块，你看到的情况是集采中大量药品降价。医保局作为一个主要的集中买方跟你谈判，这是国际惯例。药品价格降了99%之

后仍然有利润。之前允许有仿制药，用这部分的高利润去养创新药。现在虽然将药品的利润降到一定程度，但实际上卖方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在现有基础上已经可以进行创新药的研发，并不是说一搞集采整个医药行业就没有发展了。一方面未来的需求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产业基金也很强。利润还是保持正常的，集采不会影响医药行业的发展，集采是为老百姓服务，能够把心脏支架等降到非常好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应该做的，全球都是这样做的。

万广华：刚刚有一位提到了消费力的问题。咱们国家有将近 3 亿农民工，中国要增加消费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3 亿农民工如果在城里面安居乐业，肯定会大量增加消费。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你的消费是有限的，但是你要在这边长期待下来，你会消费很多。很多人的存钱是预防性的，尤其是农村，因为城市的社会福利相对来说比较好，而农村的福利很少。如果中央想在财政上做些什么支持，肯定要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农村还有 8 亿多人，让他们增加消费将是很大很大的一块。

左学金：刚刚三位专家和大家做了很好的讨论。我稍微说两点。关于房地产，我感觉要区分需求和需要。有人说因为有几亿人要进城，所以房地产需求永远很旺盛，但是这是“需要”，不是“需求”，我们进城农民工有2亿多，有多少农民工能买房子？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即使房地产的土地是地方政府供应的，如果我们房子卖不掉，这也会有一个泡沫，使得房价往下跌。我看恒大前一段拼命促销，现在政府不鼓励降价促销，好多地方也都在出台政策。我感觉房价还是会分化，三四线的一些地方房价会先往下调整，调整到大都市周边的时候，也会对大都市的房价产生冲击。我个人是做人口研究的，我们国家人口大概率现在是14亿多一点，有可能今年普查下来会发现我国的人口实际没有这么多，这也是很多专家的观点。我们现在粗略地就算14亿，但是大概率在本世纪末会降到8亿不到一点，人口降到将近现在的一半。如果我们不增加房子，人均也增加了一倍，所以我们统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前特首梁振英到上海来交流，他说空置率这个指标对房

地产土地供给很重要，但是我们国家统计不出来空置率，我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粗略地统计应该很容易，可以看电表，看水表，晚上 8 点钟看灯光，这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个人非常赞同万广华教授的观点，我们还是要推动消费，大家不要以为推动消费就是要财政补贴。首先，我们初次分配要提高公平性，比如对小孩子的义务教育投入公平吗？还有我们对社保的费用是累退，收入越高，缴的费用比例越低。我们二次分配以后，有一些项目是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不是优化了收入分配，这些东西首先要调整掉。农民工进城以后，能不能拿到市民的待遇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是做人口的，我感觉我们确实要考虑人口长期趋势，对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内需，还是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都是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对人做更多的投资。

我们再次鼓掌，对三位嘉宾的演讲和互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参与者，大家积极参与了讨论。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62 期 2020 年 9 月 2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各位再次通过线上见面，我也期待能够尽快和大家在线下见面。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国际形势，中美紧张关系有增无减，逆全球化势头很猛。在逆全球化的背后，各个国家都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重，民族主义情绪比较高涨。有的人说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那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怎么划分？大家可能对这些问题也有一些困惑。全球化进程发展得不错，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正确理解民族主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

鼎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感谢乔秘书长对我的再次邀请，上次邀请我大概是五六年前，这五六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今天讲的是“帝国政治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起源、发展和未来”。这个题目和新形势是比较贴切的。

30年前，美国是世界规则的制订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推广经济开放的自由主义，政治的民族主义，称作第三次民族浪潮。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规则的破坏者。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叫民粹民族主义，也非常厉害。美国，印度、日本、土耳其、中国国内以及日本、俄国、韩国、越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近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涨。大家现在想知道，当前强大的民族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当前世界的民族主义发展跟以前不一样。

全世界民族主义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18世

纪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包括英国的大英帝国民族主义，对外是帝国，对内搞民族主义。到了 19 世纪中，民族主义开始变成保守的民族主义。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逐渐变成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和左派见面。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主义和法西斯见面；到了二战以后，民族主义分成两大类，但主要的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见面。当时毛主席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到了 80 年代，民族主义又和自由主义见面。目前民族主义到处找人，什么样的都有，丰富多彩。这个过程怎么发展的是我报告的第二个宗旨。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有什么误解，是我报告的第三个宗旨。我的报告是通过历史，把它发生、发展的主线串起来，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民族主义的起源、发展、未来，以及是什么东西。

在民族主义领域，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大家林立，但是我认为这些大家都犯了几个错误。主要有五个错误。第一个，民族主义起源单一，而且起源比较近代。比如 Tilly 认为族主义是战争起源。

捷克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哲学家之一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工业起源，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有认同感的工人阶级。目前的耶鲁教授 Gorski，认为民族主义是宗教起源，宗教战争导致民族主义产生。Anderson 写过一本书《民族主义和现代通讯》，可以把它叫作通讯起源。当然，这些大家没有直接那么讲，但是书里面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民族主义有“民主”因素，这个是大家多多少少都认同的。民族主义需要有公民权利、公民义务。民族主义一定要有民族，制造民族英雄。

第三，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民族主义。好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婚了。坏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和族群概念结婚了。

第四，民族主义一定要有客观基础。英国一位民族主义研究大家 A.Smith 说，前现代原始族群是逐渐发展的。

第五，民族主义是能保护地方文化的。

实际上这五点都是当前民族主义理论的误区。我的报告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解构这五个目前学术界盛行的观点。

我的理论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的生活。我9岁的时候，太奶奶86岁去世了，我只见过她一面。但我是长子长孙，我去了之后，要磕头什么的，很多礼仪。我就很不高兴，我也没怎么见过她，不知道是谁，让我对着她棺材磕头，我就不干。当时我爷爷按着我，我不跪下去，他打我一巴掌，我就害怕了。爷爷命令我跪下，我就跪下了，命令我磕头，我就磕头，但是我很生气。晚上回来，爷爷给我做思想教育，说抗战的时候家里就靠太奶奶等等，主要讲家族历史，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不理解，不懂这套东西。爷爷要我不忘初心，他让我对家庭认同，靠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强制。打小孩，就是政治。第二，晚上打完我之后，为了让我跪得更愿意一些，给我灌输意识，给我讲家庭的历史、家庭的故事。所以，一个家庭里要建立认同，都要靠意识，要强制，不能靠客观的基础。民族认同是认同，家庭之外的认同肯定要靠某种外在强制来建立，而不是客观基础。

我这一个小时的报告里有一个理论主线，叫做政治和意识互动的视角，我认为这才是理解民族主

义产生和发展最有效的视角，而不是世界理论大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我今天还要强调，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都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对全世界的强加。所有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包括中国的中华民族，都是被动的回应，而不是客观事实。虽然是被动的回应，在西方思潮和西方政治主宰的客观条件下，非常有必要。也就是说，中国当然需要造中华民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中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不见得是唯一有效的回应方式。我接下来在倒推民族主义的产生。

第一个转折点应该叫意识形态突破。当然突破不是为了民族主义，它和今天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必然的呼应。但是犹太教的确种下了一个种子。为什么？人类怕死，又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就像种地怕虫灾，出去怕遇到强盗。人类活着总是需要保佑，死后需要寻找意义。这时候就会想象各式各样的神，但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越无聊越国际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宗教都差不多，有树、有风，有庄稼作物、动物，什么都有。但是神的地位逐渐产生高低了。怎么产生的？政治变了。我这个部落把你打下

来了，我肯定是我的神保护了我。这样一来，我统治你，神统治神，神的排序高了。随着社会分层，神也出现了分层。周朝和商朝的最大区别，是祖宗神变大了，别的神也有。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初步排斥性认同的形成阶段。那时候出现了犹太教，我的神既保佑我，又保护别人。现在上帝是世界性的，但是犹太教刚产生的时候，上帝只保护自己人。这时候，就出现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群体扩大化，群体扩大到一个大的族群。第二，与其它群体关系对立化。第三，群体之间的边界清晰化。如果单单有犹太教，没有基督教，是不行的。因为犹太教很难扩大，这时候就出现基督教了。基督教早期也是犹太教。基督教一开始受罗马帝国打击，但是这个打击实际上不是太厉害，基督教逐渐变成国教了。意义是什么？它缓冲了犹太教式认同形式，同时维持了犹太教式认同的零和特征。就是说，只有我对，你是错的；我的上帝是真理，你的上帝是谬误。犹太教是“民族”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帝国”的宗教。中世纪后，基督教世界分裂，欧洲国王对本国宗教的控制加强了，使得欧洲世界基督教“民

族”化。

第二转折点是再征服运动、宗教战争、主权国家形成和国王对本国宗教的规训。没有基督教的“零和扩张”意识形态特性，十字军东征、再征服运动和宗教战争就都不会发生。强行推行君主推崇的宗教或者教派和强行改教造成了“现代”第一波大规模“族群”清洗和被迫移民。宗教战争撕裂了基督教世界，给了君主在基督教式的理念下加强了对本国宗教的控制和改造提供了合法性。西欧各国出现大规模认同感整合，民众的国家认同开始加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导致主权国家的形成。国王开始对本国的宗教精神进行规训，这个国家的人如果不信教，要么被杀死，要么被赶走。这个过程在17世纪之前发生好几次。路德之后的宗教战争，撕裂了基督教世界，给君主在基督教理念下加强对本国宗教的改造控制提供了合法性。这个改造，在英国、法国都发生了几次。所以在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若干个国家，通过君主强行推崇宗教或者强行改教，实际上造成了现代意义第一波大规模的族群清洗。17、18世纪以后，英

国、法国建立民主国家的时候，老百姓信教文化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差不多并不是原来整合得好，是该杀的杀，该赶的赶，杀的差不多。这导致欧洲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认同感整合，民族之间认同加强了。欧洲产生文化整合，实际上和我们宋以后新儒教产生的文化整合差不多。我们中国的精英层面文化整合得很好，但是文化整合并不一定代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完全负面的。比如说，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抵抗西方列强，我们需要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负面性也非常大。

在第三个转折点，真正的民族主义产生了。这个转折点从1756年开始，那时候发生七年战争。七年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复杂，简单讲就是法国、英国在斗，法国和奥地利是一帮，奥地利当时叫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和普鲁士是一帮。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叫法不确切，欧洲人打世界大战不知道多少次了，七年战争就叫世界大战。战争主要战场却在美洲。七年战争最后是英国赢了，但是这个赢比输还惨，为什么？因为英国没有钱打

了。英法革命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就是七年战争，七年战争导致英国不得不在美国加税，使美国人发动革命。法国人对此很高兴，就支持美国革命，这也使法国债台高筑，产生法国革命。这两个革命都有民族主义话语产生，革命之后有以下两个变化。第一，国家认同成为西欧部分国家（主要指英国、法国、荷兰）一些普通人的认同，并且认同的人数在扩张。例如法国革命以后，法国的农民，好多人说的还是不同的语言，主要还是地方认同，同时也逐渐有了一点国家认同。拿坡仑来自科西嘉，在国外侵略的时候采取了法国认同。第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开始在西欧国家产生，英国、法国和美国是三个主要国家，西班牙、荷兰稍微有点影子。第三，革命和民族主义都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帝国政治的企及和非企及结果。大家都说民族主义是打破帝国，民族自强，实际上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是帝国政治的遗产。没有帝国政治，就没有民族主义。

在当时的世界，成型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都

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逐渐产生的。当时的民族主义话语权，都是自由、平等。并且，因为英国和法国已经经历过多次的族群清洗，所以洗得满干净的，这导致他们产生民族主义的时候，说认同法国的就是法国人，是不是法国的血统无所谓。但是你不要以为他那么说，就会那么想，知识分子的脑子是很笨的。所以，这导致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第一个误解，就是民族主义是争取自由解放的旗帜，民族主义是好东西。

随着民族主义产生，文化上有相当大的繁荣。例如音乐，在民族主义产生之前，欧洲音乐是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音乐，民族主义产生时出现了浪漫主义音乐，每个国家都出现自己的代表作。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看过罗马尼亚电影，罗马尼亚音乐实际上就是几个人编的。大家认为民族主义是保护民族文化、推广民族多样性的，那是错的。浪漫主义音乐实际上是在进行一次文化清洗。本来你去采风的话，每个地方每个村庄都有不同的音乐传统。但是波兰一旦出现几个肖邦，马上就出现波兰音乐的说法，下面的音乐要么是市井

的，要么被洗掉了。所以实际上，民族主义客观上就是在进行文化冲洗。中国也是一样，有了民族主义，我们地方语言，像上海话现在没有多少人说了。

第四个转折点就是拿破仑的扩张。如果没有拿破仑的扩张，民族主义就是美洲形式，拿破仑的扩张导致了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扩张。政治家是很奇怪的，政治家脑子里面装的是给定时代的浆糊，浆糊是各种颜色的，导致知识分子很难理解当时的政治家。拿破仑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呢？第一，帝国扩张，第二，民族主义。拿破仑喊着自由平等的口号，以至于像黑格尔等很多人恨不得拿破仑明天就打过来，把黑暗的德国制度打掉。拿破仑一路打到意大利，打到德国，一边还到处宣传自由平等、民族主义，打西班牙也一样。但是毕竟这是军队打过去，法国军队照样烧杀抢掠，法国的那些农民刚吸收进来当兵也很野蛮，大字不识一个到处抢。很多知识分子一开始傻乎乎的，后面特别失望。但是有一点，拿破仑把很多法国的思想，把民族主义，给欧洲，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种上了。

德国、意大利出现一大堆民族主义者，都是对拿破仑战争的反应。所以这时候出现了族群民族主义，族群清洗原先主要发生在法国西欧，在德国、波兰、俄国这种事情没有发生，特别是西方族群清洗的时候，好多犹太人，好多民族，还往东欧跑。所以东欧中欧是中西方移民的缓冲，人群住的非常杂，而且大家从来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前现代没有杀过人，现在就要补课，要杀一点。突然之间这块地方是我的地方，你得走，出现了族群民族主义，德国这块土地是德国人的，意大利土地是意大利人的。出现族群民族主义的原因是，人群这块抹布在中欧东欧很脏，在法国和英国已经被洗干净了。所以这帮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说，只要是认同法国的就是法国人，这是胡说八道的话。这么一来，族群民族主义就很可怕，你不是我这个族群人，要么把你赶走，要么把你变成二等公民。这种情况导致知识分子说，原来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民族主义，像法国、英国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坏民族主义，就是德国。这是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其实民族主义什么都可

以，它性质完全不只是这两个，比这个多得多。

第五转折点：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维多利亚英帝国的主宰和民族主义的进一步扩散。民族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和英俄争霸过程中扩散到了整个欧洲，乃至部分亚洲地区。族群清洗开始发生在原奥斯曼帝国控制地区。原本远离西方的中国和印度等传统文明体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西方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刺激了各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同时西方也是民族主义人才的培养地和书写非西方国家“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库。

中国和印度这些传统文明原来没有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帝国，一个文明。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是在汉人里产生的，汉人没有民族主义，是在藏人和维吾尔族人里产生的。因为当时英国人想利用藏人、维吾尔族人，英国和俄国都想利用。原先中学的教科书上说，当时很多英国人在新疆散布民族主义情绪，很多英国人其实是拿着英国护照的伊斯兰人，实际上是英俄两家争斗，把西藏和新疆的民族主义情绪在 19 世纪中叶左右挑起来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方，希腊独立了，埃及独立了，

罗马尼亚独立了，保加利亚独立了，塞尔维亚独立了，一个一个都独立了。而且基本上每个地方独立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族群清洗，所以民族主义和族群清洗往往很难分家。

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的，西方帝国的帝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刺激了各个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但是西方也是民族主义人才的培养地，是书写非西方民族主义民族史的思想武器库。比如像甘地，像很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原来在印度的时候认为自己就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很骄傲，但是到伦敦之后，才发觉原来自己是二等公民。19世纪是种族主义的时代，章炳麟为了写中国也能够赶上文明，把中国人写成是世界各国移民移到中国的。如果把19世纪末期已经改良之后的日本，也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看作西化以后的东方的话，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大都到过20世纪初的日本，像鲁迅、章炳麟、周天华、秋瑾，还有孙中山、梁启超等都在日本待过。

第六个转折点是就是一战。我们知道一战是帝国政治的产物，但是一战之后，导致了几个现

象。第一，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民族主义的发展每一步都是帝国政治的产物，但是随着民族主义的推进，某些帝国就垮台，剩下的帝国继续搞帝国扩张，结果一不小心，又导致战争，生产出更多的民族主义。一战以后，垮台了几个帝国，奥匈帝国垮台了，奥斯曼帝国垮台了，英帝国明显衰落，俄帝国则以苏维埃形式得以保留。在所有帝国垮台的地区，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族群清洗。比如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人族群清洗，我们能知道是因为当时一大批亚美尼亚人逃到美国，成为教授，拼命写这个历史。但是有些族群清洗，因为人都被杀死，没有人写下来，所以连记忆都没有。一战前，中国也产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也有一定程度的族群清洗，特别是在南方，对满人的清洗很厉害，虽然不久就被制止了。尽管如此，当时大量满族人都改名改姓，这是为什么满族人在几十年时间里都失去了认同。

一战之后，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民族主义，叫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东西，它认为以后

随着我们各民族平等了，自然会取消。实际上这个意识形态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帝国之下，19世纪中后期一大堆少数民族对俄国越来越反感。为什么呢？第一，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传给他们了。第二，俄国人自己也要打造俄罗斯民族，在打造的过程中，用俄语教育俄罗斯少数民族主义的年轻一代，像斯大林什么的，俄语说的很好，就是学校俄罗斯化的结果。这些少数民族贵族的儿子，像斯大林这一辈，很难搞民族主义，因为俄国当时满强大的，各地很分散。这时候他们想不如在俄国里一步到位，直接搞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搞平等。这就产生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存在的基础是经济不平等，而共产主义是超越民族的。这是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的第三个误解。其实民族远远不同于经济不平等，甚至政治不平等。

一战后发生了1929年的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及一战之后法国过度压制德国，还有很多复杂原因，导致了差不多在30年代，法西斯变成主宰。今天一提法西斯，人们就很害怕，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你不是法西斯，大家都觉得你落后，是傻

瓜。因为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各国都走不出来，哪个国家搞法西斯，哪个国家经济就走出来了。所以当时法西斯是希望，当然纳粹是法西斯里的一个品种，这个后面也导致二战，二战的原因很复杂我就不讲了。

一战和二战期间，日本对亚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我要强调一下。日本对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三大突破。第一，日本的成功为各国提供了模板，因为日本能够把俄国打败，这一来大家都想学习它，包括中国。第二，日本对各个国家的侵略刺激了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日本甲午海战之后刺激起来的。第三，日本作为占领者，结果也成了传播者，这是因为当日本往东南亚和南亚打过去时，当地人对日本的侵略看法完全不一样。印尼等有些国家，主要是荷兰殖民和法国殖民的国家，好多人把日本人看作是解放者；只有在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国家，像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没有把日本看作解放者。这样，日本在占领的地方不小心也传播了民族主义。

第七个转折点是二战后德、日、法、英帝国的

垮台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全球化。二战以后，世界分成两个阵线，资本主义阵线和社会主义阵线。当时我们有一句话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意思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民族主义实际上在一战左右，已经开始在老的文明国家产生了。但到了二战以后，才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产生。原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很多地方是没有人统治的，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历史的，突然产生民族了。非洲也是一样，原来没有历史，没有国家，哪有民族？二战以后开始产生了大量的无历史民族，他们强行打造一个民族主义。二战之前的民族问题，都有很强的客观基础，斯大林不是说了吗，民族主义要有共同语言、共同宗教等客观基础。但是，这错了。二战以后，大量的民族不需要客观基础，只要想象你是一个民族，就是民族了。这既揭示了知识分子对民族性质老的误解，民族主义一定要有客观基础是错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误解，认为民族主义不需要客观基础，凭空想象也是可以的，但这个也是误解。

二战以后的整个世界形势，按照毛主席当时的分析：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民族要革命，这是世界的三大潮流。毛泽东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二战以后，各个国家都在搞独立，这是第一次民族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但是那时候的政治照样是帝国政治，因为当时美国在世界上到处支持一些右派国家、独裁国家。而苏联和中国当时代表世界民族的进步力量，哪个国家搞独立运动，支持的要么是苏联，要么是中国。当时美国属于守势，苏联属于攻势。但是这个攻守到了 70 年代末以后，逐渐变了，苏联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大，苏联的帝国性质也越来越明显。相比之下，美国随着生物革命、信息革命、计算机革命，力量全面超过苏联。卡特以后，美国不再支持右派独裁国家，开始支持民主了。这一支持，产生了美国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就是第三次民族浪潮。

第八个转折点是“第三次民主浪潮”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在 70 年代末开始到 20 世纪初，在将近 20 年时间里发生。第一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和苏联的解体。第二是世界

上第一次出现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是美国。第三是民族主义的性质突然变了。民族主义，讲一个不怎么正确的比喻，就像一个人，看谁有钱，就跟谁结婚。民族主义刚开始的时候，是跟自由主义结婚，这之后跟自由主义离婚，将近 200 年后突然又拥抱自由主义了。这样就出现了一大堆喊着自由民主口号，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国家，像东欧，南斯拉夫，民族主义重新又和自由主义结婚了。当然大量的自由主义，都是假自由主义。例如美国支持民主，我要从美国拿枪拿炮、要美国支持我，我就喊着自由民主，把另一帮人打掉，除掉了旧的独裁者，新的拿枪拿炮的人又成为新的、更保守、更反美的独裁者，美国直接傻掉。我当时一直在西方，西方的知识分子庆祝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客观事实却是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族群清洗。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面，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胡扯。中国自由主义有个比较有名的知识分子叫秦晖，他认为只要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种族清洗。但其实印度在独立的时候，族群清洗，就死了上百万人。客观来说，族群清洗在塞尔维亚、俄

国、车臣等大量地区出现。而且好多第三次民主浪潮建立的国家，很少国家民族是有效的，它的效率很低，很差，这个原因导致了反扑。实际上美国输出民族主义时，当地国家的建构没有起来，这时候当地就形成了强人，有的地方是强人政治，有的地方甚至是部落政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混乱，这个混乱就导致了恐怖主义的出现。我们知道，二战以后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主观性，后来越来越主观化。印度尼西亚还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当时这块土地上是受统一的殖民主义者的控制。第三次民主浪潮出现了港独和台独，他们彻底主观。像港独，他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他就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认同基础进一步主观化。

第九个转折点是第三次民主浪潮的终结和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多样化。实际上回头来看最近十年，美国输出民主和当年苏联输出革命，效果都好不到哪里去，很差。如果说作为对当时苏联输出革命的反弹，导致苏联自己的垮台，美国输出民主造成了美国最近三四十年来国力的大规模衰弱。第三次民主浪潮中民主性质高度多样化。香港、台湾捍

卫什么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实际上香港和台湾搞运动是非常保守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法西斯性质，只是嘴巴里喊自由。美国搞民粹民族主义，土耳其搞宗教民族主义，现在民族主义五花八门。为什么呢？17世纪以后，人类开始产生宗教之外的意识形态，他拍拍自己脑袋，就能想象一个世界，设计一个世界。在启蒙运动之后产生了意识形态，世界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分化。民族主义找不到一个大老板结婚，就找小老板结婚，当地的老板是谁，就和当地的老板谈。印度的印度教比较厉害，民族主义就和印度教结婚；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厉害，就和伊斯兰教结婚。所以民族主义到处找下家，这就导致今天的民族主义高度多样化。这个高度多样化不但反应了当前世界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为什么呢？美国当前的学者还在写书，给民族主义前面加定语，他们要知道，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没有性质，见谁是老板，就跟谁结婚。

总结一下，一共六点。第一，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犹太 - 基督教意识形态和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

与东方文明无关，其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单一原因决定的。第二，民族主义不是保护地方文化的法宝，而是地方多样性文化的杀手。第三，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帝国的坟墓，帝国政治既激发了反应性民族主义，又是民族主义的推手。第四，民族认同不仅仅是反抗者的武器，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精英也会很有兴趣，甚至有野心来构造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是一个上下都有帮手的意识形态。第五，民族主义没有本原性质，总是能和影响正在上升的意识形态结合，并产生多个变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这东西，产生了就不可能没有了。犹太教产生了，就像一个病毒产生，变大，传播，不可能没有。理论上讲，任何意识形态都会过时，唯独民族主义很难过时，一旦产生就麻烦了。第六，一个产生了独立欲望的群体，即使没有特殊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基础，也能声称自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并且用当前世界的主导型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站在道德高度，强行制造认同感。所以民族主义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进行建构的意识形态。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谢

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赵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还是有一定深度的。从历史上回顾，可以说近代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一共是九次。我听赵教授说，以后还会写成论文，我会很认真地拜读。下面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如果没有，我先提一个问题。你说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帝国的坟墓，帝国政治也激发了反应性民族主义，又是民族主义的推手。我们的经历过程中，民族主义就是毛主席讲的民族要独立，那时候很多非洲国家独立了，那时候是比较正面地看这个事情。当然最近很多元化，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两者有不同，到底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大国政治或大国地位的变化，还是由于意识形态本身？

赵鼎新：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二战以后，当时的国家独立运动，背后推手也主要是美国和苏联。当时美国大力推民族独立，英国不肯让很多国家独立。别看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在斗，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在推民族国家，美国的圈子美国在推，苏联控制的圈子苏联在推。但是当时的意识形

态呢？二战以后，很多人认为国家要独立，就要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当时首先是利用这个手段达到独立的，特别是中国，起的榜样作用非常大。你看别的国家，印度当然也独立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印度不是靠自己独立的，主要是二战以后英国不想管了。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是自己打出来的。这时候，中国、越南这些国家，实际上对世界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大家都看到希望了，可以自己打出来独立。但是第三次民主浪潮这一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自由民主，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在搞。今天其实美国自己也搞不懂，美国支持埃及民主运动，但是选出来的是伊斯兰兄弟会。美国又很害怕，又通过政变把它弄掉。美国现在已经是没有严肃性了，支持自由民主运动已经不那么积极了。当然美国力量也在减弱，而且美国以前支持自由民主为基调的民族主义运动过头了，在反弹。导致了大家对民族主义好像不怎么相信了。应该说美国帝国的世界影响在大规模减弱。

李念：赵教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你的理论，

批驳港独和台独？

赵鼎新：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呢？原因我们都很清楚，台湾搞自由民主，台湾是第三次民主浪潮里搞得相对比较成功的。应该说看着比较有序，政党比较和平，但是民主对经济带来什么好处？什么都没有带来，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台湾还不如深圳。台湾老百姓拿到什么好处了吗？没有。实际上服贸是比较开放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反服贸运动很保守。虽然我这个理论在客观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主观上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是有一点，这个东西发表出来，至少对港独和台独的道德高尚感有一定程度的解构。

张明海：民族是否有客观的基础？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民族其实还是还原成人群，基础是不是就是个人的自我认同，是群体的有形或无形的契约。如果是这样，启蒙思想还有发展潜力吗？

赵鼎新：先说最后一个问题。我完全没有否认启蒙，我是感到遗憾。我们都是启蒙的儿子，但是启蒙的一些激进的思想，我是不认同的。因为启蒙

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反基督教的理性运动，但是启蒙运动毕竟是基督教文化产生的，还是有几大很不好的东西。第一个是进步史观，当前谁说话声音响的，当前谁打仗赢的，肯定是历史的前方，别的都是后方，这是非常糟糕的。启蒙思想鼓吹宗教自由，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不相信我的文化，你和我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大打出手的。基督教文化中，只有我对，别的都是错的，这种精神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理性思维，带来大量好东西，我不是在反对启蒙而是遗憾。实际上我们要保卫启蒙，而不是反对启蒙。而且，我们中国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中国人目前还都比较理性，虽然中国宗教复兴的比较厉害。从全世界看，从美国、中东、南亚、东南亚、近东、俄国某些地区看，宗教已经强势得一塌糊涂。

民族刚产生的时候，当然需要基础，但是它骨子里却不需要基础。它是可以造的，比如港独。台湾 90 年代时，中国情绪强得一塌糊涂，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们完全没有自己不是中国人的感觉。但是在李登辉以后，改造教科书，改造历史，慢慢的

台湾意识形态出现了。它可以有基础，但是一旦政治家或野心家占领一块土地，强造也是可以的。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和精英群体，也会制造民族。统治阶级很难搞阶级把自己推翻，没有这个兴趣。但是社会下层都能搞民族主义，统治阶级也有兴趣，上下都有帮手。

左学金：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是什么，是民族还是国家？美国是民族国家吗？

赵鼎新：实际上，严格意义讲，目前都应该叫国族国家。但是国族国家内部也有很多不一样。美国华人不叫民族，美国黑人在语言上文化上明显不一样，黑人讲的话我们不太能听懂。美国如果由中国人统治，肯定把美国的塞尔维亚人、华人、黑人，都搞成一个一个民族，识别一大堆民族出来。但是美国没有搞民族识别，就是把它搞成一个族群，彻底搞主观的。美国好多人在考大学的那一年，突然变黑人了，考完大学又不是黑人了。但是，中国认定了56个民族，那就做死了。问题是中华民族到底怎么造，是一个打造的过程。章炳麟带着一定的法西斯倾向，带着一定的族群倾向，把

中国少数民族都认为是野蛮人，茹毛饮血的人。中国的中华民族，18省，当时东北也不是，内蒙也不是。当时中国继承的是满清的土地，当时保皇派建构民族主义更像西欧。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时候才变成一个大的认同。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政治家手上的牌越好，他越是白痴；手上的牌越坏，他越聪明。中国政治家打牌打的最好的是谁？是邓小平，为什么？80年代他手上拿的全是坏牌，所以他脑子极其聪明。牌好了，就乱打。这个不只是中国，西方也一样。中国的辛亥革命时候的政治家，手上拿的牌是什么？一手好牌。印度要搞民族主义是非常难的，原来大英帝国用一个公司把它统一起来，下面一大堆邦国，各式各样的宗教，各式各样的政治，印度人要把民族造起来很难，当然后来杀了不少人。印度是一手坏牌，中国是一手好牌，为什么呢？宋有了新儒学之后，中国的儒学文化下沉得很厉害，导致大概1949年以后，中国96%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是汉族。在民国的时候，这个数量更大，97%-98%。当时很多回族人，你说他是回人，他是不干的，他认为我们

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马步芳在青海大力推广汉化教育。中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底子太好，导致中国的汉人和政治家，当了领导之后，竟然就没有认真造过中华民族，就稀里糊涂地过来了。后来我们还有另外一张好牌，就是共产主义，当时少数民族很多知识分子也都相信共产主义，维吾尔族，新疆地区，蒙古地区，都在苏联的边境，都相信共产主义，他们也都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超越民族主义。我小时候对中国 56 个民族什么都不知道，以为就是纸币上印的，大家过年过节穿着各种衣服到天安门跳世界大团结舞，我们始终分不开中华民族和汉族。改革开放以后，新疆西藏的民族意识逐渐起来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不为我们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精英统一意识形态基础的时候，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想到要造中华民族，开始出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自古是一家等等这些话。中国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基础好，导致我们关键时候没有好好建构这个话语体系，现在建构当然也不晚，但是困难就大。

乔依德：非常感谢赵教授的精采演讲，他涉及的很多问题，我们平时一般接触不多。但是，至少

对我来说，很有兴趣进一步去了解，去学习。我特别希望赵教授论文写出来以后，能够发给我们看一看。再次感谢赵教授，也感谢各位今天参加我们的沙龙，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